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九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六七期 ——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210b）

---

【劫后反思】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下）	唐 伟
【人物追踪】	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	颜昌海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劫后反思】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下）

• 唐 伟 •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读后

（续 z k 1 2 1 0 a）

第二部分：清华的教育

清华文革大戏收场，劫后余生的清华并没有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资中筠先生说，它已经不是我上学时的清华了，现在的清华聚天下英才而毁之。

1985年清华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从现在起的十年，是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发展阶段”。1993年初的暑期干部会和教代会代表大会都赞成把学校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到建校100周年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1998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正式提出：“为了实行现代化，我国需要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并且确定北大、清华为国家第一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大学。这个目标既是学校的愿望，更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去年4月是风光无限的清华百年校庆，是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却再也无颜提起。“学

校愿望、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成了让人怎么也笑不起来的笑柄。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曾是我在兰州大学时的学生，他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是“向金钱献媚，向权力下跪。”是啊，不知哪个下流无耻的马屁精把涛哥的照片放得最大、放在二校门图案中最显眼的正中央，把母校众多的先贤、恩师的照片作为陪衬、台柱。尴尬呀！你让涛哥情何以堪！你让母校情何以堪！你让我们情何以堪！

最近，出了一个说脱口秀的北美崔哥，他说北大建校以来出了600个名人，而清华只出了一个蒯大富。这不禁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三个分别来自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吹牛。人大的说：“我们学校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党领导的老师都在我们学校。”清华的讲：“我们培养出了最多的省部级高官”。北大的最谦逊：“我们学校只出了一个图书管理员，但他领导了中国28年。”北美崔哥说得不对，清华名人中至少还有一个涛哥。他和老蒯都来自江苏农村，都是蒋南翔时期清华学生中的“红人”，太多相似的学生生活和共同的清华文革经历，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在优胜劣汰的管理制度下，本应出现难分轩轻的毕业生。奇迹出现了：一样的种籽，种在一样的土地上，同时生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一个是造反有理、“痞子”掌权；一个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这让我们不能不膺服教育的神奇功能，去找寻其中的道理，去重温如同魔咒般的校训。

## 一、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个标题是我抄黄延复的，一个字都没改动。黄老先生毕业后就在校史办公室工作，我读他编写的书籍资料如聆面训，清华往事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把枯燥的工作干成了兴趣盎然的专业，直到退休。他在故纸堆中找寻人生、心系母校且不忘育作他人，任何一个清华学生心中都会有一丝感动。

1914年冬，梁启超正在清华“赁屋著书”，学校就趁机请他给学生作一次“伦理演说”。梁先生欣然接受邀请，并自定演讲题目为《君子》。他分别引《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描述君子人所应具备的精神和品格。他勉励清华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

1917年周诒春任清华学校校长期间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作图制徽，定为校训。1949年以后，镶嵌于大礼堂额顶的“清华学校校徽”图案被一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覆盖。老校训从此被人淡忘。上世纪末，覆盖校训的红五星被揭掉，大礼堂上的老校训方才重现。1999年，1958级校友集资将一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字碑镶嵌在老图书馆大厅北壁上。2000年，学校新建东南大门，又把这八字校训铭刻在大门口的巨石卧碑上，以志永远。

## 二、蒋南翔的“校训”：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蒋南翔时期清华没有校训，只有“南翔精神”。“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八个字可以概括“南翔精神”。但它不如“听话出活双肩挑”，“听话出活，驯服工具”明白生动，深入人心。“听话出活，驯服工具”才是当之无愧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已被覆盖，清华园内再也无人提起。

蒋南翔是1932级清华校友。这位青年团中央副书记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前不久，清华大学遭到了建校以来最蛮横的肢解，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航空系、采矿系……均被切离清华，一个综合性大学变为剩下8个系、22个专业、15个专修科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对于这

个对教育事业破坏极大的“院系调整”，现在极少被人提及，更不用说反思教训。父母死了，子孙不忘拜祭。母校惨遭肢解，却从不再提起，只想从心里忘记！“欲灭其国，必亡其史”。我们就是这样的无耻、无颜的人子、学子！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时，学生最多的系是政治系。现在津津乐道的国学大师，就活跃在清华学校最后的两三年中。清华理学院的创办人叶企孙和他开创的充满理性光辉的整个时代，离开了他生命中永远的清华园。这个对中国科学贡献巨伟的大师，生前无人看望，死得无声无息。仅仅是因为他无儿无女？仅仅是因为文化革命？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真实的历史，而少数知道的人慑于恐惧而接受“党性”的约束。文理大学可以不设工科，文理学生不须精通工艺、了解生产流程，实验数据可以通过交流获得。工、农、医等应用学科的学生，须臾不能缺少数理逻辑、理性思维、历史启迪、人文关怀。学校被肢解后的清华学子要获取诺贝尔奖的梦幻追求，如同残奥会选手妄想获得奥运会冠军。在“院系调整”中，清华这个美国人用中国人的钱办的中国大学还不是最惨的，那个对中国情真意切的司徒雷登，用心血和意志浇灌出来的燕京大学被挫骨扬灰，美丽的燕园成了她美丽的衣冠冢。从此，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在中国大陆绝迹。清华的断臂残肢，在政府权力魔杖的点化下，奇迹般地长成了矿业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林学院……，斯大林不仅送来了建造大学的图纸，还派来了权威的专家、教授。晚清、北洋、民国时期办学，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富国强兵、为国家培养可用人才是第一位的。“一边倒”向苏联，既受迫于国际冷战大局，也是政治需要，谁人说长道短，必是反苏亲美。蒋南翔有不同意见，那时还人微言轻，并没有置喙的地位；他多年以来耿耿于怀，始终不认同“院系调整”，但从来没有站出来秉公直言，别人劝阻并不是理由，党性原则才是原因。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蒋南翔正率领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他反对校园内搞群众运动肃反，校内主持工作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党中央决定的。党性再一次压倒了理性，蒋南翔不再坚持正确意见。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灾难中，蒋南翔惨遭抛弃，他的学生、辅导员、干将听党中央的话，纷纷与他割袍断义、划清界线。蒋南翔倒台后，清华的“保蒋派”中除了刘冰等极少数人，什么时候有人站出来为蒋南翔说过公道话？文革的哪一个群众组织不拿批斗蒋南翔来标榜自己革命？蒋校长不是一个坏人，每个学生都受过他语重心长的教诲。他对自己几乎贡献一生的教育事业痛心，而清华文革也让他丧失了自己推行的那一套教育理念的自信。1981年，为了争取区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全国高校学潮汹涌，我当时任兰州大学团委书记协助刘冰校长处理学潮。刘冰几乎每晚都要和蒋南翔部长通电话汇报学潮情况，蒋部长每次都要问一句：你那个团委书记表现怎样？我已经持有了蒋校长给清华毕业生授予的“猎枪”，也从蒋校长的关切中感受到了他对清华文革的反思和担忧：他或许想起了1966年8月的那个夜晚，“马楠将军”当他的面将他继母吊在梁上毒打的惨状，亲眼目睹自己播下的“龙种”，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魔鬼、惟命是从的小爬虫和满世界乱窜的“跳蚤”，悔不当初的心情可想而知。一个高校的团委书记如果变成了耗子屎，足可以坏掉学生思想工作这一锅汤。蒋校长对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不无忧虑，这绝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和教育的成功。

梅贻琦还有一句更精采的名言：“没有坏学生，只有教坏的学生。”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何等慈悲、何等浩荡的胸襟胸怀！蒯大富、涛哥、也包括孙怒涛和我，以及我文章中提到的所有同学，都不是坏学生。2005年，在我们入学40周年的校友聚会上，张孝文校长对1964级、1965级的学生讲：“你们虽然没有在清华造就成才，如同面粉没有被蒸成馒头，但你们进校前就已经是好面粉了”。找寻清华文革罪孽的原因，不能不认真反省清华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训，而是情真意切的校训。

有同学将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发到了清华校友网上，一位同学指责我对“联动”分子的温情。我不是因为“联动”分子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手上染血，心上支楞着罪恶的十字架，我只是不愿让貌似义愤的怒火烧红自己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是什么人、什么事教坏了他们。暂时离开一下蒋南翔，听我讲讲我对清华高干子弟的认识，听一听“狗熊”吴慰庭的

故事。

吴慰庭的经历能回答不少问题。孙华栋是武斗中第一个当了俘虏后被活活打死的同学，凶手有多名“清华技工学校的莽撞小青年”，领头的人绰号“狗熊”，原自控系67级学生、团派“前哨”广播站负责人、保卫组的吴慰庭。1968年5月14日“晚上，‘414’无线电系64级同学孙华栋骑自行车从动农馆返回科学馆，路过一教时，被团派同学绑架至一教楼内，遭‘狗熊’及在一教的中技校的一些人毒打，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80%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给喝水后死亡”（摘自《清华文革亲历》）。1968年在清华的批斗会场上，“狗熊”被押送部队农场“劳改”，后被公安机关判刑13年，刑满那年赶上“严打”，他又多坐了两年牢。1985年48岁的“狗熊”和因为“出身不好”又要照顾多病母亲的大龄女李大姐结为夫妻，未育子女。

2007年初冬，来访清华的外宾可以看到一个七旬老者孤独地在寒风中擦洗工字厅的玻璃窗，那老者就是四十年前打死孙华栋的“狗熊”。现住天津的“狗熊”年迈患病，没有社保、医保，也就没有退休养老金。李大姐的退休金刚过千元，两人平均刚超过了天津市的低保线，“狗熊”又不能享受低保。街道上只好每月给个50或100元的补助。自七同学为他们捐了一万元钱，这两口子就是不用，总想退回去。“狗熊”的社保难于解决，除了职能部门的推诿、不作为外，还缺少社会、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同情。自从五年前我认识了“狗熊”，我认为他是一个犯过罪的好人，李大姐更是一个侠骨柔肠的好女人。

“狗熊”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是接管北平市领头的三个军代表之一。“狗熊”的生母是天津一位医生的女儿，救过他受伤的父亲。如故事一样爱上英雄、结婚生子。如故事一样男人奔赴革命，奔赴延安。如故事那样“狗熊”和生母从天津到南京、西安一路的艰辛寻父。“狗熊”当过大烟馆的小杂役，架电线的小工，母亲为人洗浆缝补，1953年16岁的“狗熊”才得知父亲在北京当了大官。“狗熊”生母最终也没能见到孩子的生父一面，在“组织”干预下离了婚。生母唯一的要求是要生父将“狗熊”带到北京接受良好的教育。经过育才小学短期培训，“狗熊”和陈楚三、毛远新同一年上了101中学。父亲在延安娶的“革命妈妈”厚待“狗熊”，“狗熊”每月有30元生活费，有自行车、手表、照相机。后来“狗熊”的父亲又姘上了一位国民党营长的姨太太，该营长刑满出狱后，状告共产党高级干部霸人妻女，“狗熊”父亲受到组织处分，从6级高干降为9级。“革命妈妈”在父亲再娶这位姨太太之前患尿毒症而死。“狗熊”说，她是被父亲有外遇而气死的。武斗伊始，父亲就从天津到清华一教，劝“狗熊”回家，说中央规定高干子女不得参加武斗。“狗熊”讲：陈楚三的继父也是武汉空军的高干，他能在科学馆参加武斗，我为什么不能坚守一教？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里，父亲传达中央规定也被儿子置之不理。许多高干子弟早在一年多前就离开学校，凭关系进了部队。他们有“组织”出面提点、关照，共和国都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为什么他们的子女要去经历没有好处的危险呢？“狗熊”的革命精神和正义感还表现在另一件事情上，他知道了蒯大富占了便宜又要抛弃女友刘刚，而刘刚是他继母带来的妹妹同在清华附中高一年级班里的同学，“狗熊”几次守候在强斋门口，准备伺机将蒯大富暴打一顿。

孙华栋死那一年，“狗熊”31岁。

后来，清华校办同意出一笔钱，为“狗熊”补交社保费，曾任天津市领导的65届的一位校友也出面帮助，希望他能象老蒯在深圳那样得到妥善的解决。就在这几天，孙耘发来邮件告诉我，“狗熊”的社保解决了。今天（2012年7月7日）下午我接到了“狗熊”从天津来的电话，那无法压抑的喜悦让人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酷暑严寒，为了获得作为公民权利的区区社保，他奔波、等待了6年！吴慰庭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75年中，他前16年随母寻父，中间15年在蹲大牢，最近6年跑社保，老天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生放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也

很高兴，为社会有温暖而高兴。母校代他补交了26万社保基金，除了解决就医困难，每月还能领到2900多元养老金。相信听过他的故事的清华同学都会为这对患难夫妻的晚年生活有靠而感到宽慰。

吴慰庭的一生令人同情，他少年时随生母寻父的经历更催人落泪，他狂热、冲动、冷酷和暴戾的性格绝对不会事出无因。父母是人生第一个启蒙老师。有的高干父母如同戏台上威风八面的英雄，下班回家后也从不舍得“卸妆”，传唤儿女训话有如贾政召见宝玉，如果家中是赵姨娘当政，亲情上的冷就足以摧毁一颗幼小的心灵。不少高干子弟也许生在硝烟战乱的小路边，长在马背摇篮的艰苦岁月中，未必得到了发育阶段应得的关爱和教诲，引领他们走上人生道路的人，也许只是家中的保姆。他们在新社会光荣门楣的优裕生活中，有人德才缺失、恩义淡泊也在情理之中。“英雄不讲出身”。高干家庭一样人才辈出。陈育延曾告诉我，她家在中南海住过一段，与陈伯达家比邻而居。陈伯达的女儿喜爱文史，可陈伯达坚持毛主席讲的“学了文科也没用”，只准许女儿报考理工科大学。陈伯达的女儿最后拒绝报考大学，去部队当了兵。父母，尤其是大人物的父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儿女身上，是多么不近情理的事情。在清华，上到蒋校长、下至政治辅导员，对高干子女最欠缺的就是一颗平常心。

权力可能腐蚀当权者，也就不可能放过他们的子女。

追究清华文革种种表现的因，不能不深刻反省清华的教育。反省文革前的清华教育，蒋南翔同样是绕不开的话题。用韦君宜的话讲，蒋南翔到清华当校长是把“一肚子教育理想都带去了。”蒋南翔的办学理念既有个性，更有党性。“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39岁的蒋南翔迈进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清华园。”他是带着党化教育的任务到清华当校长来的，从到学校的第一天，在他的讲话中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日益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中的阵地，这是我们学校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1980年，死里逃生、重掌大权的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重复和重申了这段话。蒋南翔在清华校长的岗位上工作了13年。1988年5月3日，蒋南翔因胃癌去世，临终前还对清华大学当时的负责干部说：我认为“又红又专”比“德才兼备”这一提法更确切。

60年代的清华学生早已无从知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耳熟能详的是“南翔精神”。“南翔精神”伴随蒋南翔来到清华。1953年初，清华成立政治辅导处，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南翔精神”开始生根；“南翔精神”大成于1958年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提出的“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南翔精神”完善于1961年形成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这个《高校六十条》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系统地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经验，用主要精力草拟，并多方面征求意见而形成的。196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高校六十条》，并得到毛泽东的核准。毛泽东说：“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半个世纪以来，蒋南翔之后的清华历任领导萧规曹随，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上殊无建树，“南翔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蒋南翔后来担任了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其实清华大学在“南翔精神”指引下早就办成了党校。有人总结说，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就是纠正毛泽东错误思想的理论。其实说这句话的人高看了邓小平，邓小平只是在毛泽东的专政思想框架内，添加了经济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兴奋剂。对于毛泽东、对于文化革命这两件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大事，他极不负责任的敷衍塞责，“宜粗不宜细”的回答等于在历史的拷问下交了白卷。清华何尝不是愧对历史，看看清华的校史展览和反右、文革，许多重大事件被恶意删除，一些良知缺失而又权势在握的人物早已丧失了坦然面对历史的勇气，这样的组织行为只能是更加可耻可悲！

“南翔精神”并不主要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而是毛泽东思想在教育战线上的体现，是毛泽东“自己的东西”。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只是渗杂进“南翔精神”中的私货，清华文革中被他的包括政治辅导员在内的学生们，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严加批判。蒋南翔只是“南翔精神”最坚定、最忠实的执行者。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乏善可陈，他虽然就学于师范，也算一个有旧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却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这也许与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的打工的经历、一段“卑微的伤心史”有关。他指责北大“庙小妖风大，池深王八多”。这是一种恨惧交加的复杂感情。他对清华并无偏见，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修好之前，毕竟有清华体育馆的室内游泳池供他享用。他并不是教育家，却特别中意“伟大的导师”的称颂。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提出了“三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又红又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学习解放军”，包括1964年2月13日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蒋南翔等16人参加了座谈，从传达内容看，也就是些标语、口号：

“教育的方针、路线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

“学制可以缩短。”

“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

“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

“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毛泽东所谈的教育是党化教育和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把宣传和培训也当成了教育。

清华大学不是党校，但却办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以培养“毛主席的好战士”、“三大革命运动战士”为目标，这是蒋南翔的功劳。老蒯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的典型，涛哥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得好”的典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造反有理，痞子掌权”和“又红又专”，既是毛的号召，也是“南翔精神”。早在文革前，清华学生都在争当“听话出活，”的“驯服工具”，这是清华校风中的主流精神。

“党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对教育进行控制，把教育变成宣传党义的工具，是国民党最早在中国推行“党化教育”的。1924年，国民党仿效苏联，首先在广东推行“以党治国”的政策。为了制止学校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停止了“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实行“党化教育”。随着“北伐”的胜利，“党化教育”蔓延到全国，所有学校都开设国民党“党义”课程，教育变成了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

集“党化教育”大成者是蒋南翔。除了开设马列主义政治基础课，评选“先进集体”活动，蒋南翔特别强调：“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蒋南翔创造性地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党化教育”在工作中落到了实处，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这是他推行“党化教育”最突出的贡献。

1953年，蒋南翔让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何东昌起草了一份向高等教育部、人事部请示设立政治辅导员的报告。根据“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的标准，从当时在校最高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了25名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的学制延长一年，学科则相应减少，每周进行24小时工作。辅导员队伍归团委领导。经过清华文革十年劫难，1977年政治辅导员制度得以恢复，当时学生中党员已占多数，已不宜由团委管理辅导员队伍，清华第一个成立学生工作部，负责全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还逐步增派了一批博士生担任辅导员。

第一批25名辅导员第一次会议是在新林院蒋南翔校长家中召开的；50年代有突出表现的辅导员被选送苏联留学，学习新学科、新专业，返校后就成了新学科、新专业的创办者和学术带头人。这一传统在后来，改变为优秀辅导员不须考试直接就读研究生，“多数辅导员给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据1993年统计，现任12名校级干部，其中10名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系主任、系党委书记及机关正部、处长中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约占45%。最新的统计是：清华大学1949年后培育出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1人，中共中央委员50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国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9人，省部级领导280人；全国人大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7人；全国政协副主席13人，政协常委116人；最高法院院长1人，最高检察长1人。清华，只有清华，才有这么多的“听话出活”、“双肩挑”的人才。“教授治校”见鬼去吧，清华大学“以吏为师。”

思想“灌输”的效果和成败，不取决于灌输者，而取决于被灌输者是否接受。而接受灌输的前提是受灌输者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不难看出政治辅导员必然要先受其害，更不难理解为什么服从、听话的奴仆思想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式。所以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的清华牌政治家多如星辰，而兼有人格魅力的清华牌政治家却寥如晨星。

政治辅导员学习的马列主义理论，主要有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刘少奇的“两论”，即《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团委在党委第一书记刘冰指导下，贯彻《高校六十条》编写的《团支部工作五十条》。其中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等论述影响至深。

1957年的“反右斗争”，才是政治教育的生动课堂。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一举击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必须“夹起尾巴”才能“做人”。“反右”第一线总指挥邓小平亲自到清华作报告，毛泽东钦点那个说“什么话”的黄万里教授成为了“右派”。公开的原因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写了《花丛小语》，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党必须过河拆桥和民主党派分道扬镳，不整肃多嘴多舌的知识分子，如何统一思想？黄炎培在世的另外两个儿子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没听说有什么“右派”劣迹和言论，也一个不漏地被打成“右派”。毛泽东调侃黄炎培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一门五右派”的黄炎培还敢和毛泽东“窑洞对”，夸夸其谈什么“周期律”吗？蒋南翔和蒯大富一样热衷权力，经常提醒身边的干部“要有政权意识”。钱伟长教授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是解放后首届校务委员会成员，又被派往苏联学习、访问，有新中国学界“三钱”之美誉。

钱教授聪敏博学、全知全能、眼生于顶、口若悬河，对蒋校长多有不敬；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婿，袁氏夫妇是和平解放北平、有功于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因为阶级斗争中手软，而成了蒋南翔的掣肘。“有政权意识”又不乏阶级斗争警惕性的蒋校长，岂不要打造一个从这里漏气的发动机？和钱教授、袁书记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师生有500多人，和清华文革中被抓出来的“蒯派”人数相差不多。毛泽东因抓出300多万“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超越秦始皇等历代暴君，夺得“坑儒”之冠；蒋南翔因清华反右斗争制造恐怖而赢得威权。在“反右”之后提出的教育方针，红专目标再无人反对，“党化教育”大行其道。又红又专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通俗图解，也是“南翔精神”的核心内容。又红又专来源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22条，讲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早在1955年11月7日在发展刘仙洲副校长入党的支部会上，蒋南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就是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

1958年以后，又红又专的指导思想就成了抓教育的一条主线。蒋南翔常对学生讲：“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只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政治往往成为更重要的决定因

素。政治是解决方向问题，方向不对头，就达不到目的。”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服从分配。如刘仙洲、张子高、梁思成等著名教授成为了“文物”，除了撑门面当摆设，他们在学生中几乎没有学术上的影响；而如张光斗一类投机钻营、腆颜造假、曲学阿世之徒却见风得风、见雨得雨，光荣入党，一直爬到副校长的高位。一大批“蒋南翔式的”、“双肩挑”干部，从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从政治辅导员、“助教党”的队伍中成长起来，和找到“归宿”的老知识分子实现了“两种人会师”。一个“永不漏气的发动机”就这样打造成功了。

1958年，在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领导下，团委着手整顿辅导员队伍，重申辅导员制度的要求，全校辅导员从150多人减到80多人。1977年何东昌指示，尽快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至今这个制度已有了近60年的社会实践，培养出了大批优秀辅导员，不仅充实了校系领导班子，而且为党中央领导的梯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涛哥就是最杰出的代表。

当上政治辅导员，在学校里，就意味着成为最优秀的优质生，“革命事业接班人”已经非我莫属。有了这样的耀眼经历，毕业以后都能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辅导员是他们的晋身之阶，所以他们对辅导员制度感激不尽、赞扬有加。

有一位辅导员出身已经成为金字塔之顶的高官回清华对学生现身说法：“做辅导员工作可以密切和学生们联系，更重要的是，做辅导员的经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学会与人与社会打交道，对一生的成长都很有用，不吃亏的。”当我问起我所熟悉的一些辅导员时，他们也是类似的感受。他们多因为有助于本人的成长来肯定辅导员制度的。

在我看来，政治辅导员制度所起的作用主要有这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机会对同学进行“兴无灭资”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灌输、监督、控制，清除异己思想，排查异己分子。

教育、灌输是软性的一面。所谓灌输，就是洗脑，洗掉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注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过程，其实与传销的洗脑差不多的。辅导员们自己先被洗脑，然后再洗周边同学的脑。不仅要将与正统说教有异的思想清洗掉，那些有点棱角的个性、正常需求的私心，统统都在纠正、克服、抑制之列。青年学生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最后被灌输成单一的红色，再没有其他的色彩。监督、控制则是比较硬的手段，这针对那些教育、灌输效果不够理想的差质生的。

教育、灌输、监督、控制的具体措施五花八门，无孔不入。其中有一种叫“个别谈心”的，是我最反感也最害怕的。辅导员和颜悦色地找你促膝谈心，表面上看似亲热、平等，目的就是套你的话，从中找出思想倾向上有问题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会放过。辅导员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你禁闭的。偶尔，他也会说一点他的想法。当心，这是一种“钓鱼谈话法”——以自己无关紧要的小事把你思想上偶尔一闪的隐秘想法钓出来。谈完回去以后往往会记在工作笔记本上。一次次的谈话，加上其他各种场合下观察到的表现，成了你完整的思想档案。到了某一天需要“帮助”你的时候，一条条有日期有时间有地点有场景有旁证的记录会翻腾出来。到那时，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差不多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反动学生了。

辅导员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是不断地锻炼、考察、培养辅导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维护体制的骨干力量。政治辅导员才是今后掌权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他的人，不过是革命事业的打工仔。这些辅导员，名曰又红又专双肩挑，都是根红苗正，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观点鲜明，对党无限忠诚，在学校期间已经学会掌握了如何控制群众思想、如何制造革命舆论、如何搞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掌权的手腕。



我不否认我认识的不少辅导员本人的品质都是不错的，我也不否认他们为同学做过不少的实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辅导员队伍只是执政党统治学校、推行教育路线、扼杀独立精神、实施思想禁锢的工具。在文革初期蒋南翔刚刚倒台的时候，一些激进学生的矛头最先指向的是与他们接触最多矛盾很大的政治辅导员。我看到有的大字报上把辅导员每月18元的生活补助费叫“养狗费”。这种污蔑人格的说法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不赞同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那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对辅导员制度已是很反感的。现在看来，如果把执政党比喻成一家“大院”的话，那么，这支辅导员队伍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看家护院”。

以上引文来自孙怒涛《拷问》中没用上的材料，这是一个清华高年级师兄的真实体会。

学生政治辅导员大多来自“红五类”的农民、工人家庭。尤其那些坚信“王子永远是王子，贫儿永远是贫儿”，既顺从又听话的同学，最适合辅导员工作，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他们纯朴勤奋、感恩心切，对“奴化教育”、“痞化教育”殊无反感。植根底层民众的奴隶思想、皇权意识很快上升为对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阶级感情。因为只有那种奴性入骨、惟命是从的人，才是最适合被打造成暴力机器的胚子。

1965年，蒋南翔在毕业生大会上讲：“毛主席1957年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作了分析，我们可以把思想过硬概括为三个境界或比喻成‘上三层楼’来要求：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后来的系统提法是：

第一个台阶，是做爱国的文明的守纪律的学生。

第二个台阶，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国家分配，自觉自愿为人民服务。

第三个台阶，对学生中一部分先进分子，要帮助他们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以上部分内容主要抄自2005年版的《蒋南翔传》和方惠坚的《清华工作50年》。）

“党化教育”本质上是虚伪的，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奴化教育、痞化教育。黄万里是1953年评定的二级教授，出于对官僚体制的抗议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拒绝写申请当博士生导师。还说：“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黄万里成了清华唯一拒绝写申请，而没有当上博导的教授。

蒋南翔曾说，“红”就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服从分配。曾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就是一个不服从分配的反面典型。黄菊是清华电机系电机专业63届学生、班团支部书记，毕业前夕表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听说要分他去大西北，他害怕艰苦，放弃分配，溜回上海，在上海人造板机械厂参加了工作。他的行为为老师、同学不齿，电机系可能都没给他发毕业证书，他也从来不敢回学校。贺鹏飞勉强考上清华，1970年分配到甘肃武都地区工作，去那里看了一眼，就被那里的艰苦环境吓回来了。贺鹏飞回京途经天水，巧遇和我一个年级、分到武都工作的段姓同学，一番交谈下来，段同学也不服从分配了，他们一起逃回了北京。贺鹏飞已在若干年前死去，死时任海军副司令、中将军衔。

不能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只是虚伪地喊“精忠报国”的口号，能不给清华丢人？

无数事实证明，如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废除任何带奴役的契约，就无法指望培育出美德。

清华学生在清华文革中的表现发人深省，孙怒涛还在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任主力军是青年学生，既有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竟成了只听命于领袖的枪手，充当了无辜的炮灰呢？

党的教育方针是在反右以后的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已经上了高中，对这一方针出笼前后所受教育的变化有切身的体会。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初几年，要恢复国民经济，要镇压反革命，要抗美援朝，要土地改革，要搞合作化，要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等等。及至政权比较稳固以后，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斗争，标志是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对教育实行全面控制，标志是提出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

回想起来，对我的德育影响最大终生受益的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党的教育方针。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个“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个时候没有提“爱共产党”，也没有提后来替代“爱护公共财物”的“爱社会主义”。

到了高中，开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因为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当大跃进成为全党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以后，即便是一所县中，也要垒起小土炉炼铁。因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于是，垦荒种地、夏收夏种成了一门分量最重、占时最多的课程。

政治与教育，是有关联的。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是相对独立的。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把教育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这完全是错误的定位。

更为错误和荒谬的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必须为某一党派的政治利益服务，成为某一党派狭隘私利的工具。至于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的方针，也是极端化的。

无论是叫又红又专，还是叫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有用人才，或者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意思都差不多的。在清华，这一培养目标有一个通俗形象、简洁明了的叫法：听话出活。所谓听话，当然是忠心耿耿地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党把你放在哪里就在那里死心塌地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就是“红”，就是“德”，是政治标准。

听党的话，落实到具体，不仅要听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党中央的话、领袖的话，还要听从基层党组织的话，听从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的话，甚至是听从一个普通党员的话。总之，就是听领导的话，听上头的話。脑袋是用来吸收、消化党的指示的，不是用来独立思考的。谁要是有点自己的思想，有点个性，那就意味着与党离心离德，与党不是一条心，那就被视为开始走上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道路了。

所谓出活，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以精湛的技术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能为党高效率服务的工具。这是业务标准。

在听话与出活上，听话永远的第一位最重要的。

要培养听话的人，首先必须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也就是“兴无灭资”：灌输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思想等正统思想，其他的思想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封资修的，都必须彻底清除干净。

于是，从高中到大学，被灌输进脑子的是这些东西：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是永远英明的、不会犯错误也没有丝毫缺点的，抗战八年打日本鬼子是全靠八路军新四军的……

红专大辩论、参观反右展览、联系实际的“九评”学习、学习“毛选”、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雷锋、参加“四清”、政治课教育、党课、还有各种各样形式多样的活动、会议、参观、座谈等等，都是我们上过的阶级斗争主课，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听话的人。

我并不一概否定这些活动，也不是说这些活动的效果一无是处。作为原本纯洁的学生，我们是从正面去接受这些教育的。譬如“学雷锋”，我们从中学做好事，付出爱心，这是对的。但在这些活动中，各级组织的着力点是增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也是在强力灌输阶级斗争观念和奴隶意识。

不同时期的青年学生，都有共同的特点，如有爱国心，有民族自尊心，有政治热情，追求进步、真理、正义，向往光明美好的社会，单纯，幼稚，勇敢，易被鼓动，易受蒙骗，等等。文革前的青年学生，经过十多年的党化教育与奴化教育，更增加一些新的特征：对领袖无限忠诚，对毛泽东思想深信不疑，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特紧，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无比痛恨，敢为共产主义理想赴汤蹈火，等等。这样的一群青年学生，个个都愿意成为红卫兵、党卫军。文革之所以能得以发动，原因之一是学校已经为文革准备好了成百万的冲锋队员、枪手和炮灰。

孙怒涛的思考痛心疾首。“党化教育”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发生了极大的混乱，以小骂大帮忙见长的党内大笔杆子邓拓，竟被自己献身的组织构陷委屈上吊而死；明史专家吴晗校友“曲学阿世”，视学术精神如玩物，把一个朱元璋写得颠来倒去，为迎合圣意宣传“海瑞精神”，反被诬为“反党分子”彭德怀一党，夫妻双双受尽羞辱迫害致死；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了出来，清华骤发雪崩，从党委到基层支部的负责人，乃至个别政治辅导员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党性发生“变性”，再无其他纲常伦理来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精神大厦。清华大学被损毁的不仅仅是“二校门”，蒋南翔鼓吹的“三层楼”也轰然坍塌了。

### 三、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殉文化”而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鲁迅说：这位“老实得象火腿一般”的国学大师，在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两年后，“便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了。现在清华一教西北小山坡前的王国维纪念碑上，镌刻着陈寅恪窥破天机的不朽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纯为知识、学术，勤奋读书、游学，是“中国最博学的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他以洞悉幽冥的历史眼光，看到了“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代表的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彻底破产，“戊戌变法”是中国人第一次企图从政治制度上文化自救而以失败告终的行动。慈禧没得选择的选择了“晚清新政”，刚刚起步的“立宪运动”被“辛亥革命”一枪毙命。宫帷深锁的帝后奢糜生活让站起来了、富起来了的中国人梦萦魂牵、艳羡难已。爱国压倒启蒙，爱国主义成了蒋校长政治思想教育的第一个台阶。民主、科学只是时髦的口号，“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了最有广告效应的“烂尾楼”，值得我们年年凭吊。最迟钝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赤县神州遭逢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国社会的上一次“奇变”，始于“商鞅变法”，大成于西汉“独尊儒术”。那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演进。“天人合一”的封建文明支撑起了一个泱泱大国三千年的农耕社会。元、清、俄、日……的异族入侵和蚕食，一次次地阻断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和平崛起。任何一个文明古国失去了今天，也就没有了过去，不管过去何等强大、如何辉煌。一次次的救亡和内斗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久历劫难还不是最可怕的，“劫尽变穷”让中国人无路可走才是最可怕的！陈寅恪如同窃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以大勇气、大智慧、大情怀、大心愿昭示读书治学的知识分子要铭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一“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训导，要象张骞一样去“凿空”，去劈开中国变革图强、建设崭新文明的大道。

陈寅恪的校训比梁启超的校训晚十余年，同样没有被贯彻在清华的办学宗旨和教育理念之中。由于对今天教育乱象的反思，有的人高估了民国“黄金十年”教育发展的成绩，轻浮地说什么“中国高等教育30年里走过了西方办大学1000年的路程”。不知道丑陋的中国文人什么时候能改掉总是夜郎自大、蛙鼓蝉鸣的坏毛病。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毕业生总数只有10万人，只是今天一年大学毕业生的六十几分之一。仅此一点可知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多少骄人的成绩，《围城》中的假文凭和野鸡大学生，生活中照样有。问题是我们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有问题，不信任知识分子，不尊重他们的劳动。用杜牧的章句形容：“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按照黄延复老先生关于大师的标准：“大师者，至少应具备以下五种品格：高尚的人格、博通的学术、深邃的思想、卓绝的识见，儒雅的文采”。我斗胆以为除了陈寅恪、黄万里、叶企孙等寥寥数人，还有几个清华教授配称为大师？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都是在海外高校完成学业、做出成绩的。不能把栽培他们的功劳全都归于中国教育事业。当然也不应抹煞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战乱频仍、非常艰苦的环境中的卓越工作。在清华，梅贻琦校长就是楷模。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潘光旦合作撰写的《大学一解》中。他主张大学之道：明德修己、新民、止于至善。大学的直接目的：发展学术、作育人才。他要求学生具有“超阶级”、“超党派”的“宏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不应该给学生以某种政治派别的思想，只应该给学生判断的能力，让学生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他要求学生对于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宽广的综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全人格”的人，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他还主张“才不通而身不得出”，即没有通识准备的人，不允许其参加社会事业，社会事业才可能良性发展。为了感受一代教育大家的流韵风采，我不去说他那些枯燥乏味的“通才论”、“大师大楼论”、“坏学生论”，下面有三个故事感人至深。

梅贻琦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2·9”学生运动后，军警将到清华抓捕宣传抗日的进步学生。梅贻琦校长将军警的抓捕名单张贴在布告栏中予以公告，在教师、工友的掩护下，蒋南翔等被通缉的

学生全部安然逃脱。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梅贻琦民主治校，在于对校长一职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他曾说，校长就是在戏剧中饰演皇帝角色的人，他端坐戏台中央高高在上，但他不是剧中主角，除了一两句自我介绍的道白，甚至连一段象样的唱腔都没有。我曾设想有一天，重临西南联大旧址，在校园草坪席地而坐，手捧台湾作家鹿桥的《未央歌》，追怀那个国难岁月的大师风采。抗战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资历、人望都在“寡言君子”梅贻琦之上，但他们都信服地支持梅贻琦主政校务、共度时艰。梅贻琦一生从未遭逢异词谤语。我私心暗忖：蒋南翔校长也能做得到吗？

真学者视学术为生命。梁思成回国的目的很纯粹：共产党来了也会有人盖房子。说到梁思成自然难忘风华绝代的林徽因，林才女患肺病喜静，据传梅校长曾命人在新林院梁宅前竖一警示牌：“林徽因住此，请勿喧哗。”梅校长做事如此风雅，实不让六朝故事，令人追忆神往。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没有被人从校训中“腰斩”掉，因为它从来没有成为清华校训。民国政府致力推行的同样是“党化教育”，蒋总统梦寐以求的也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任何反民主、反人权的独裁政权，注定与现代文明无缘。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已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了3000年了，果真“天不变，道亦不变”？身为“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帝师”、被传统文化彻底“化”了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投湖而死去“殉”哪门子能够永世长存的文化？我曾偏激地说过，只讲天道、地道而不讲人道的知识分子是伪君子。且不说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八级台阶”的人生追求中有多少权谋欺诈，只是向“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牌位磕头的拜师礼，就能说明这是培育奴才的第一课。启发兴趣，提倡思辨，鼓励怀疑精神，推崇超越前辈先贤，让学生认识自己、做好自己，才是教育的真谛。有如亚里士多德超越老师柏拉图。孔门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哪个学生超越了孔子？两千多年下来，汲鹏说是“老鼠下崽，一窝不如一窝。”现在清华检讨自己：“自强不息有余，厚德载物不足。”纯属脸皮太厚的文过饰非。

徐葆耕学长和我有数面之缘。他俨然已是清华“国学专家”，我有点难以置信。他为了称颂今日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风貌，提出了一个荒谬的“灾难铸就辉煌”理论。这个理论有点奇怪，它不追寻灾难的原因，总结灾难的教训，也不去寻找规避灾难的办法，只是出人意外地歌颂灾后的辉煌。

这个理论颇受主流青睐，并广为流行，地震、矿难、高铁出轨后，这个论调都能在主流媒体上“辉煌”好一阵子。徐葆耕有两个例证：一是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是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二是清华“文革动乱后，在‘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徐葆耕：《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载刘琅、桂苓编著《大学的精神》页19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灾难铸就辉煌”，通俗说法是：“灾难就是辉煌”，这是毛泽东的“破就是立”的破坏哲学的另一种表述。常识告诉我们，创造和建设才能铸就辉煌。当年西南联大师生生活异常艰苦，闻一多教授要业余篆刻图章换米求生，如果生活无忧，他们的学术成就是否会更为斐然？乱离人可怜！文史学生尚可苟且延读学业，科研、实验应当难以为继。那时的清华学人之所以还能有所成就，只能说明专制的学术钳制比战乱还要不出学术成果、还要让人才思枯竭。葆耕学长是否也要像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谈话那样，像无耻地感谢日本人的侵略那样去感激灾难呢？

至于说到文革后清华的堕落，罄竹难书四个字有点过分，痛心疾首是国人的真实感受。葆耕学长也看到了，“对于一个班、一个班的（清华学生）留学美国”，清华已被讥讽为“真正的留美预备学校”。事实上现在的清华留学生和前辈大不一样了，老清华留学生大都回国报效国家，今日留学生大多定居国外，如若回来也多半是加入了“八国联军”（坊间称世界百强企业为“八国联军”，称民营企业为“义和团”）杀到中国，回国为了赚钱。人各有志，其中原因总有不同，自然不必一切为外人道。我要强调的是：清华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上做得不好，不好到已经留不住人才了；国内工作、生活条件让精英们有了出去不回的理由。清华学生比较许多其他院校的大学生，也许是更听话、更出活的“驯服工具”，但不争的事实是：清华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更大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令人满意。还记得张孝文校长的“面粉”比喻吗？考进清华的都是优质生，如同精白面粉，我也不相信清华能把好面粉做成了棒子面窝窝头。

在给孙怒涛的信中，我曾错误的认为自由、独立是资本主义口号，是1980年代香港高楼上悬挂的商业广告：美国精神。前两天去珠海，张鸿庆再次点化我：陈寅恪的校训是他纵观古今、学贯中西，开悟得出的时代精义。新芽萌生于老树的残躯、种籽，任何新思想、新事物都切不断与陈旧、腐朽、死亡的联系。在生命将死将生之际，有能量的消散和凝聚。宇宙的历史是一部能量不断改变存在形式的变化史。吸收物质，积聚能量，构建文化，锤炼思想，微小的人类就拥有了生生不熄的力量。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如果对陈寅恪那一代知识精英采取舍弃和健忘的态度，就是对中国历史的无情，也是今天中国人的不幸！

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了，“用全人类所有的先进文化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头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达成“一切人的解放”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和全国人民一道都应具有“公民意识”？大学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是容不得盗袭兵焚的斯文神圣之地。它虽然诞生于西方教会的怀抱，但神圣的大学也禁止在校园里、课堂上宣传教义、党义。大师是人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站在知识的最前沿，站在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天堂和地狱的分界上，揭示真理、预警灾难、昭示未来。他们因自己的学术成果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他们不应该因学术思想有悖于统治思想和社会生活的“主旋律”而被整治得死去活来、挨批受“坑”。

1968年7月27日后的清华文革还有整整8年的干烧高压锅里的“热寂”岁月。本应普照天下的“红太阳”盯上了“六厂二校”，红太阳聚焦，“熵增原理”在清华出现了反常。通过8341部队的宣传科长迟群、机要秘书谢静宜，毛泽东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控制了清华。清华文革如朕亲临，继续革命的战略战术、阶级斗争的政策策略全凭圣心独运。先是制造恐怖、获取威权，具体做法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抓516分子”、办江西鲤鱼洲“牛棚”；然后是招兵买马、组织队伍、训练打手，一是从64级、65级的学生中，挑出700多名根正苗红、听话出活的学生留校充实教师队伍，视为“新工人”；二是招收各级革命委员会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红卫兵、工农兵，“两兵”大学生占领上层建筑，名为领导“斗、批、改”，实为充当打手、炮灰。最后由“梁效”写作班子吹响战斗号角，从清华、北大向全国掀起“反右倾回潮”、“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一波紧接着一波的巨劫连绵，无休无止地冲击着赤县神州。这不仅是“党化教育”，更是党的“全面专政”。毛泽东劫尽将亡，他也会惊惧于陨星天象，伤感于枯树文章。哪一个知识分子不被他折腾得思想麻木、精神癫狂。若干年后，巨恶元凶阴魂不散，涛哥出来宣布：“不折腾了”。大家觉得反正“劫尽变穷”，跟着涛哥得过且过罢了。于是清华百年校庆齐颂盛世、大唱赞歌：“精忠报党”！

迟群是个痞气十足的烂仔，小谢只是后宫嫔妃、答应中比较能认字的人，他们来自掌权痞子的身边，有如来自奈河桥那边的牛头马面。其实权力有自我扩张的天然秉性，和个人的道德品质无关。让全校师生员工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是原始的丛林法则，却非常有效，这就

是秀才遇到根本不和你讲理的兵的心理劣势。

那八年中，清华成了兵痞横行之地，被逼死的人、被批斗的人、被冤屈诬陷的人、被体罚被侮辱的人比哪个时期都多。毛泽东认为清华文革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结合“清队”、“抓516”、“整党”甄别干部，重建各级组织。批斗、恐吓、引诱、揭发是一贯手法，利用捕风捉影、知情人急于洗刷自己去立功举报，只要还有自尊自重，不会佯狂自污、唾面自干、宁弯不折的人，多半不会平安过关。工化系副系主任李文才文革时作为交流学者在英国学习，武斗结束前才回到清华，工宣队认为他和清华运动、清华派系没有关系，打算第二天把他“三结合”进入系领导班子。但考虑到他在北京x中学读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就找他谈话，要求他第二天写出交待材料。当天晚上，李文才因惊恐而自杀身亡。在批斗工化系党总支书记滕藤的会上，党总支副书记黄志冲被罚站在滕藤身边陪斗。由于黄志冲是清华教工子弟，说话多、欠严谨，又分管学生工作，接触人更多，留下的把柄也多，可供揭批的言行比滕藤还多，教工的发言多冲着黄志冲去了。据滕藤后来对我说，黄志冲一定认为他是工宣队在工化系的主攻目标。批斗会后黄志冲越想越怕，上吊死了。

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是一个废弃了的劳改犯农场，占地9300亩。首批398名教职工于1969年5月到达，先后有3000多位教职工及家属在这个血吸虫病区斗私批修、改造思想。1970年查出血吸虫病患者747人，疑是血吸虫病患者111人。我的三哥、工化系教师唐晋也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1971年10月全部人员撤出鲤鱼洲，迁至北京大兴团河农场。奥斯维辛集中营杀人用毒气，迟群、小谢用生物武器，不仅环保，也利于隐匿真凶。你若拷问血吸虫，它绝对不会招供主谋就是那个1950年代诗中讲血吸虫已被“照天烧”了的毛泽东。

迟群、小谢用“冷暴力”构筑的专政机器，在教育、培训（包括军训、下工厂农村劳动）、宣传之间划出了两个等号，即：教育=培训=宣传。他们名为关心青年学生，实则利用、出卖青年学生。清华的教改经验是中南海痞子总店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直销过来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里的样板，简称“六厂二校经验”。

毛泽东亲自抓的清华教改，是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讲，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需要的只是奴隶中的工匠。谁都可以看出清华“斗批改”的教育革命有多荒唐。但它远离教育宗旨，偷换教育内涵，以教之名义，行害之实质却并没有被注意，更没有被清算。在教育产业化的荒唐指挥下延续至今，怪不得资中筠痛叱清华聚毁人才。熊庆来说：“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倡导的就是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知识分子做事做人的两大原则，也就是熊庆来讲的“学术生命和精神”。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改革无定式，无法预设蓝图；改革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改革并不痛快，大多相当痛苦；改革就是做学问，须钻研更须积累，“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投机取巧，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只能像“大跃进”那样害死许多人。

提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就是承认学术文化不仅是事业，而且是超越国家、政党、阶级利益之上的事业。陈寅恪说：“国亡然能有史，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诫，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国家危难，史学衰落，此已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死继绝的大节”。只有这种气吞山河，包容万物的“雅量”，才能保持华夏民族文化火种长燃不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是育人育己的方向和目标。也就是马克思主张的

“人的解放”，从自在走向自为。梅贻琦说：教育本身必须以每个个人为对象，从每个个人的自身着手，其目的就是首先要促使他们的完整人格的养成。

陈寅恪于1953年12月1日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到：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当然，毛公、刘公岂能“应从”陈寅恪的“狂悖”之言，没有治他的罪也只是因为他名气太大，1953年的文网也还没有收到后来那么紧。但陈寅恪坚守大节的心志、胆色却令人动容。

黄万里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敢于担当的清华教授。我的长兄杨美卿曾是黄先生的学生，后来又同在水利系泥沙教研室工作。黄先生“怀璧沉沙”的坎坷人生和难得的人品、才情、学问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对三门峡工程的论断的正确，已被时间和实践证实。我在读黄万里时注意到以下几件事：密云水库建成几十年来一直是北京的主要水源，也是清华教育革命拿得出手的主要成果之一。黄先生计算了水库上游河段历年的流量，曾向钱正英部长建议降低大坝的高度，在“经济困难时期”节省投资自有利国利民的特殊意义，但是他的建议无人理睬。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落难教授，如果没有学理精通的大胆识、没有对专业的执着、没有对国家强盛的一往情深，他怎么还要去面对钱部长等人丑陋的冷脸，而自讨没趣呢？

反对修建三峡大坝工程，是黄先生临终都耿耿于怀的不解心结。他早年考察过几乎所有的川江水系，如同预言黄河的泥沙作祟，他预告长江的砾石将堆积三峡水库的库尾，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形成极大的祸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我，乃至我的长兄杨美卿教授都没有能力判定黄先生的意见是否正确。但是论证三峡工程不让有资格和能力的黄先生参加，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能叫重大决策前的科学论证吗？黄先生还提出缓冲意见：用建三峡大坝不到一半的钱，在川江上游建10个水电站，发电能力即可与三峡电站相当。黄先生于1992年写《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1995年写《吁请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决不可修！》，从1992年1月到1994年，黄先生连续致信江泽民总书记、中纪委、监察部，有的信甚至用了举报的方式。对于一个知名教授几近疯狂的抗争，有关部门和有关大员一直装聋作哑，显足体制没有人性的冷漠。2001年8月27日黄先生溘然长逝。弥留之际他挂记的还是长江、三峡。临死还问女儿：“黄委会你知道吗？”对于关系重大的“南水北调”工程，黄先生也有宝贵的建言，惜乎同样没人理睬。“黄钟毁弃，瓦釜长鸣”，这个典故用来说谁呢？

专家总是片面的，不片面不能成其为专家。黄万里先生不是那种专家级的匠人，他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家学渊源、文词高雅；数学、力学功底扎实。1930年代初的黄河、长江水灾，促成了他改行水利，一生求学只是为救国救民。他以学习为最高最大的善行，不断更新自己的已有知识。他发现熵值和焓的单向变化将控制水流、泥沙的运动，他不断用新知识、新理论增进对江河水系的认识。“热力学第二定律”、“混沌理论”都是他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是毕生都在潜心学习，学问不断精进的大师。黄先生一生坎坷，活得艰难，生于忧患，死也遗憾。实践证明，黄先生没有错，是拥有权力的政府和上级组织错了；黄先生并非不幸，他有值得为之奋斗的学术和真理，不幸的是国家和人民！先生仙



去，我们怎么能不痛惜大师！

我相信教育可以兴国。由于深圳大学罗征启校长（当时张维任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召唤，我放弃了甘肃省委常委副书记刘冰校长给我安排的省委办公厅的副职，于1984年1月来到深圳大学创业，希望能跟随清华师长在特事特办的深圳特区，办成一所争创一流的高等学院。罗征启在深圳大学改革最精彩的一项是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我在深大任党委办公室负责人。党办有4名工作人员，后来增加了1名发余热的老干部——人民大学前任组织部长徐景秋做顾问。党办是全校唯一的党的专职组织机构，囊括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工、青、妇的所有工作；党委书记和各系的支部书记（当时系上还没成立总支）一律兼职。三、四年下来，学校各项工作照样生机勃勃，党员教师投身于教书育人的一线工作，没有任何特权，也没有什么党群矛盾，一点也没有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由于实行学分制，逐步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政治时事课、公民素质课和学生勤工俭学供学生选修。事实证明“去党化教育”也是可行的。

深圳大学的教育改革还是失败了。1989年的“6·4”，导致罗征启下台并被开除党籍。其实，深圳大学教育改革在这一事件的两年之前就败象显露、祸根深种。深圳大学一直未能进行民主办学的制度化建设，没有建立对校、系主要领导的权力约束机制。民主只是形式，集权才是目的。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派来的副校长和清华派来的罗校长矛盾重重，教师队伍缺少为改革出力的新血，包括清华在内的教师纷纷调离，蝇营狗苟之徒遂集权力中心，深大改革焉有不败之理。何东昌部长曾说过一句极不负责任的难听话：“罗征启，他懂教育？”我以为去掉这句话的恶意后，还是值得深思的。

“6·4”是罗征启下台的直接的导火线。总结清华文革教训，应该知道学生参加群体事件绝非好事，不管社会哪种势力竭力鼓噪，为学生前途着想，校长、教师抵死也要把学生阻拦在校园之内，绝不让他们跟着“蒯大富们”去搞什么“12·25”行动。我们过去的革命传统教育中充满误导，我就十分着迷过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她站在行进的有轨电车上抛撒传单的镜头，简直就是油画中的自由女神在引领大众奔向光明自由。看看真实的历史吧：学生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表面浪潮，深层涌动的是纷繁复杂的直系、皖系军阀之争，亲日派、亲英美派的政客之争。“五·四运动”后，北大校长蔡元培引咎辞职，内疚自己未能保护好学生。

罗征启校长作为一名党员，他犯的是组织错误，不是政治错误。周泉缨说：“罗征启得罪了中国两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在清华他得罪了陈云，在深大他得罪了邓小平”。每当念及罗征启对清华学生、深大学生的关爱之情；每当想起早上上班的路上，见到他和梁鸿文老师走走停停、指指点点，精心设计深大的规划布局，安排在哪里添修一条路，在哪里多种一片草。我的心中对他和梁老师就有一种浓浓的敬意。在深大工作时，我多次冒犯过他，说“罗校长在深大的改革事业将随他下台而一风吹掉，而他盖的房子将会成为他永远的纪念碑”。对他在深大禁止抽烟，我说过：“林则徐虎门禁烟，被发配伊犁；罗征启粤海门禁烟，将来不知会被发配到哪里？”唉！至今想来我都后悔死了，这张讨厌的乌鸦嘴！

上大学，独立思考能力最重要。真正在人类社会起作用的制度，都不是精心设计而是有机演化、逐步尝试出来的。从教育着手应当是中国改革的切入点。民主政治不仅仅是一套政府制度，民主还应该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高等学校应该是教育养成这种良好生活习惯、并有益于终生的圣地。在自由匮乏的社会里，只有思考的碎片，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思想。香港回归前，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但是无论如何，思想总是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如何面对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总理的挑衅性预言呢？这篇“读后”或许会让所有读它的人面临一场精神折磨。语云：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我把它送给孙怒涛学长和我那些传奇般的清华同学，我感谢他们在恩怨情仇的真实世界里一生与我同行。

2012.7.15

□ 原载《记忆》第86期

~~~~~

## 【人物追踪】

### 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

• 颜昌海 •

日前，笔者在两位网友的带领下，看望了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的“红卫兵五大司令”之首蒯大富先生。蒯大富先生是笔者童年时期的偶像，作为中国大陆现代史上必须提及的人物，笔者也比较尊敬。

不过，此次的造访令我比较欣慰，同时也比较遗憾。

先谈欣慰：我见面就提一个问题，“您对文革的作为忏悔吗？”，蒯司令毫不犹豫地回答“忏悔”，这令我欣慰。遗憾的是，他并不否定“造反有理”，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中国最伟大的领袖，即使他因毛泽东的罪错而坐牢，还无比效忠毛泽东。而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必须彻底否定。在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经和二次大战一样，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约定俗成，都不否认的负面案例。

很多人能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谈到如何否定文化大革命，各个人的看法又不一样。对于一些所谓老干部来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黑暗是因为整肃到了他们；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尤其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则是最残酷的利用阶级斗争迫害了民众；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青年人来说，则因为他们失学，毁灭了他们的最美好的青春，甚至改变了他们整个一生。而对于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来说，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道德传统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破坏；从物质层面讲，文化大革命对于民间存下来的书籍、文物等等，都是彻底残酷的破坏，都是最大的一种毁灭。总之文化大革命曾经有过很多的罪恶，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让人们感到不能容忍的罪恶。……

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黑暗在什么地方，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又有不同的认识。今天大陆人常见的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各种反弹，大都属于假大空，因为一切是为了政权的需要。也就是说，在今天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很多人还是党文化的语言、思想方法，还是共产意识形态式的认识。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报刊、知识界、在大学等等地方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共产概念、思想，都没有变化，仅仅是有些观点有了变化而已。现在，所有的批评也好拥护也好，基本上用的语言、方法是一样的，用的就是40年来在中国主流媒体、主流知识界、主流社会用的那些语言和方法。而一些当年的造反派、一些所谓文革中其它思想流派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阐述与看法，观点上和当初1966年是有一些变化，但在运用的语言，在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上，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方法，跳不出一个封闭的桎梏，跳不出井底。典型的例子，是最近几年的一批人尽管还曾经在美国留过学，在这些所谓文化大革命史的谈论中，同样也还是一种典型的共产意识形态式的方法。

尽管如此，在大陆及海外中国人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还是有一些新的努力和成果。

这也就是说试图跳出这个井的框架和井的封闭。跳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式的，而从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念上来提出不同的意见。比如代表性的有在美国的王友琴、宋永毅等人，通过大量的调查，整理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来揭示文化大革命；又如大陆有一个学者叫杨健，他通过搜集、整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一些青年们在思想、文化、文学上追求的资料，出版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这样的一些书；还有如王容芬女士，由于她自己在文革中以死来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监狱13年。被放出来后就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她后来到了德国，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因此王容芬在她的工作里，既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于一种良知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些辩驳或者一些揭示。还有如丁抒等人的工作都值得重视。

其实，“认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可以说是一把钥匙，它可以打开整个中国大陆过去土改、反右，以及对现在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看法。尤其，对于中国大陆人如何认识极权主义，有着特别的启迪意义。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极权主义为了巩固自己极权专政的一种典型的共产社会运动。因此，毛泽东也罢，刘少奇也罢，都不构成主要问题的两方面；他们的不同只在于如何专政群众、专政民众，如何维护权力中所采取的方法而有所不同。在这些人中，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占了上风，他所要进行的所谓党内斗争，实际上是为了巩固极权。例如，据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期曾谈到有很多人要法治，他问刘少奇怎么看，刘少奇沉吟了一会儿对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得人治。然而，1966年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就是死于人治，毛泽东连极权主义的法律都不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刘少奇实际上是死于自己所拥护的东西，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来说，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专制里的一个“运动”。

第二，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线索，人们可以看到之所以爆发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的结果。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工具；极权主义利用阶级斗争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极权专制。毛泽东在建政初期就大谈阶级斗争，到了1963年就把阶级斗争在文化领域里普遍的展开。先开始的是电影、戏剧的批判，例如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最后通过这些个批判又扩展到教育革命。

所谓“教育革命”，就是要把整个教育体系中还残留的一些一般正常社会的痕迹全部灭掉，把学校完全变成极权主义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是“红色贵族”子弟听到了毛泽东在党内一些谈话、一些风声，主动提出来搞“文化”“革命”的。他们经过1960年代初期在各校搞四清、阶级斗争后，就在学校里推动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这些文化思想革命运动，提出所谓思想革命化，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从而进一步扩大到教育革命。这种教育革命，在1966年6月到达顶点。6月22日他们在人民日报上提出的废除高考。实际上，在1960年代初期由于搞阶级路线，很多干部子弟对于上大学已经有很多的特权了。除了招考要贯彻阶级路线，出身不好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上比较好的学校。但是，因为一些干部的子女考得太差了，也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大学。到了1966年，尽管上大学最先优待这些干部子弟，但他们还是不满意，还要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要教育革命。为什么要废除高考？是因为他们认为优待还不保险，因为自己成绩太差了，就干脆废除考试。废除高考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唯一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干部子弟的特权，他们可以不经任何的考试就自由的出入高等学府，垄断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而出入高等学府，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可以牢牢的把握社会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把握权力。

这种把握教育、文化各种权力机构的努力、措施，尽管已经过去40多年了，到今天为止，极权主义者依旧在这些领域里不断在巩固这个权力。所以实际上，人们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

命”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变了的不过是形式，由“文化”、“大革命”变成“经济”、“改革开放”。然而革命也罢，改革也罢，极权主义的色彩是不变的颜色。

第三，红卫兵是极权社会维护极权的一种比党组织和共青团更加赤裸裸的工具。本来，党组织和共青团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社会的有效工具，为什么还要另外成立红卫兵组织？是因为还怕不牢靠，还要更进一步想要百分之百的控制这个社会，要更极端的来掌握权力。红卫兵，实际上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一样。在希特勒走到最极端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烧杀抢掠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而红卫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造成了1966年的“红八月”。

红卫兵——党卫军，水晶夜——红八月！1966年的红八月，在中国历史上无可比拟。人们常常把它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但实际上“红八月”的红卫兵在社会上打、砸、抢、烧、杀的场面，对传统毁灭的场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无法比的，因为那毕竟还是在传统社会对于一部分的人的。而红卫兵不仅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传统，而且也是对人类传统中的一种彻底粉碎，是一小撮人丧心病狂的一种最极端的一种行动。他们除了“红海洋”外其他什么也不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的红卫兵行动，只能够和希特勒的“水晶之夜”来相比。

第四，文化大革命是当代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典型运动”之一。人们可以把中国大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往前追溯，看一看从五四以后的极权主义运动，或更开阔的对比一下苏联1920年代搞的文化革命，以及其后1930年代的大清洗，整肃；还可以看看朝鲜、越南、古巴、当年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及东德，都有过这类党内斗争、肃清运动。甚至此种使用的词汇，“修正主义”、“工贼”、“机会主义者”、“右派”、“右倾”，乃至阶级斗争，阶级路线……都是一样的，而且都不是中国传统中的语言概念。因此，就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的现象，简单描述地说，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内部的政治运动，完全可以和希特勒、斯大林的很多运动是同性质的运动，一方面是党内权力斗争，党同伐异，一方面利用运动群众来对另外一部分人进行迫害。二者的核心问题，都是要极权，一元化领导。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尽管文化大革命现象和反右等其它现象一样，在东欧国家，在柬埔寨，在其它国家发生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它在不同的国家上演，或者演员不一样，或者所使用的语言也被翻译的不一样；但是从根本上说，演的是一出戏，是极权主义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如何运用极权主义政治手段来统治整个社会。其动员民众、运动群众的方式，与希特勒、斯大林以及东欧各国乃至现今朝鲜，所用的方式完全雷同。

文化大革命里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期间，似乎有过一些所谓群众自己起来的一些现象，于是一些人也曾经想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种民众的不满，有自己想法的运动；但实际上，却是极权主义有效地在操纵、利用了民众的情绪。比如那十年民众的各种运动，始终也没有跳脱毛泽东的手心。所有的一切，向左也罢，向右也罢，都是在毛泽东控制下进行的。在操纵、利用民众情绪方面，毛泽东真不愧一个大师。而象薄熙来，似乎在重庆也操控的较成功。

第五，“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就是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的，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不是中国传统上的事物。粉碎四人帮、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后，居然很多人还把文化大革命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是中国传统出了问题，这是很可笑的。因为这种反传统，才意味着还是在搞文化革命。从“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来说，人们也可以知道它根本不具中国文化的特点，而是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法统。

“文化大革命”，它典型的代表了西方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专家、社会学家达伦多夫说的极权主义的两个特点：一是反传统；二是反近代的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观。

文化大革命从开始的时候就是反对传统文化，而且中国的极权主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传统。五四以后到1949年以后，乃至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中国极权主义反传统的做法一直进行。而在文化大革命里，除了文化革命、革中国传统的命外，另一方面就是革当代人权、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普世价值的命。对此，红卫兵心领神会，完全体现了极权主义的价值观。比如在当初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所谓《三论造反精神》文章的作者骆小海，在他的文章里就明确的提出来要“血染华盛顿，头断太平洋”，“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这些发自内心的仇外，实际上就是达伦道夫所说的极权主义的两个特点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于当代所有代表人权、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仇恨。

所以，当今天我们谈到文化大革命，就又要回到“为什么要谈文化大革命”的题目上来。希望人们能跳出井底，能从文化大革命的现象能看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来反省今天，来反省这一切，不再像上一代红卫兵那样犯下毁了别人、又毁了自己青春的愚蠢错误。

近几年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突然又重新时兴起来，在一些当年的所谓老红卫兵里，又重新为他们当年红八月的事情翻案。并且，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突然以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自居，有的还曾经留学过美国。

他们和美国的王友琴女士、德国的王容芬女士不一样。王友琴、王容芬的研究是从案例开始研究，跳出过去那个社会加给她们的方法，而且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来重新揭示文化大革命的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来重新梳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梳理一些思想，起到警示后来人的作用。而另一些老红卫兵的“研究”，则站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对当年他们在红八月的一些事件上辩护和推诿。他们没有像王友琴那样去从事调查“研究”，而是以她自身的经验和既得利益来谈这些问题，比如在天安门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现美国人宋彬彬。

意大利一个哲学家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也就是说一切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都代表了他们自己对于现实的感受和看法。也就是说，一些老红卫兵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仅毫无反省，毫不忏悔，而且还可能成为中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与土壤。

不过，笔者见了蒯司令后，这种担忧却消失了不少。因为蒯司令尽管至今仍然崇拜毛泽东，但他在我们谈话中就明确地说，中国只有走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道路，才有复兴的希望。而这，与笔者的理念是非常一致的。可见，即使像蒯司令这样“文物级”人士，也是很明白中国将来必须要走什么路的。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